

毛泽东如何推进精兵简政

□ 钱均鹏

精兵简政是抗战时期克制制胜的十大政策之一，毛泽东将之排在仅次于“对敌斗争”的第二位置上，足见这一政策的极端重要性。但精兵简政涉及到集体力量构成和个人切身利益，因而在具体执行中并不一帆风顺，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层出不穷。为此，毛泽东专门撰文称其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及时纠正了偏向，推进了政策的落实。

精兵简政遇到种种阻碍

精兵简政在前期的具体落实过程中，个别领导机构并未做好扎实有效的政治动员，导致一些下属基层单位和个人对精兵简政认识不够、理解不透，在思想上没有引起高度重视，只当作一次普通的上级精神传达，落实不严格，引起一系列对待精兵简政的态度问题。

一是单位不愿动。精兵简政必须建立在各级高度重视、积极主动的基础上。但问题是很多单位领导自身对当时面临的严重困难认识不足，思想上还停留在抗战初期不断寻求兵力扩充、人员壮大的层次，以为兵多人多就是优势，甚至在中央已经下达精兵简政命令后，不但不执行精简，反而仍想扩大。有些地方把自己的地区或工作部门看成是“例外”，感觉还过得去，没必要精简，总是找理由消极应对，或者原封不动，或者搞点小动作简单应付一下。比如陕甘宁边区一些地方在简政前期，只取消了乡自卫队指导员。华中根据地一些人强调“特点论”，认为中央精兵简政只适用于华北，不适用于华中，要求继续编并地

方武装以扩大主力。

二是个人不愿走。由于组织上政治动员不深入，释疑解惑不及时，致使一些同志对精兵简政的理解失之偏颇，把精兵简政简单的认为是“裁员裁人”，减少吃饭穿衣的人员；有的人因为被送去学习，自认为“吃不开了”，前途渺茫；有的因为不适合某个岗位而作以调整调换，就认为没有自己的位子了，组织不要自己了；有的从军政机关转入生产部门，感觉很丢人，从心里瞧不上干生产工作的。甚至有些因为单位要被解散，就闹情绪，瓜分公物。如陕甘宁边区保卫团在整编中决定编遣三连，而连队没有做好官兵思想动员工作，以致官兵情绪发生波动，私分公产，损毁公物，甚至有些党员也参与其中。

三是说服教育不深入。编余人员无论是以何种方式分流出去，组织上都应对其进行耐心教育，告知为什么要这样做，以避免不必要的误解。比如，有些干部被送进学校培训学习，本来是党为了储备干部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而有些人却认为是组织对自己的不信任或不认可，把自己送去学习当学员，原来的职务却提拔下级来顶替。还有人从军事机关转入生产经营部门就不愿意，认为自己应朝着军事、政治方向发展。诸如此类，都是因为说服教育不到位，谈心交心不深入。

四是对编余人员关心照顾不够。有些单位把编余人员推出后就万事大吉，后续不再关心过问。比如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两个编余干部被安置到专署接受学习培训，而专署训练班未开办，随后也没有给予两人适当安置，结果一人消极回家，一人投敌。由此可见，对于编余人员的安置必须考虑周全，加强后续关怀。

应对各种阻碍采取的有效措施

1942年9月7日，毛泽东及时发表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这篇文章，深刻指出：“我们的庞大的战争机构，是适应过去的情况的。那时的情况容许我们如此，也应该如此。但是现在不同了，根据地已经缩小，在今后的一个时期内还可能再缩小，我们便决然不能还像过去那样地维持着庞大的机构。”但是，现状和习惯往往容易束缚人们的头脑，“即使是革命者有时也不能免”。为此，毛泽东用《西游记》的故事打比方说：“何以对付敌人的庞大机构呢？那就有孙行者对付铁扇公主为例。铁扇公主虽然是一个厉害的妖精，孙行者却化为一个小虫钻进铁扇公主的心脏里去把她战败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之后，各级组织从各方面加大了工作力度。

一是加强思想教育引导。从中央到各根据地党政军负责机构，不断强调要注重解决思想上的障碍。随着教育的深入，很多原先发生的问题都有好转。如陇东某旅，经过精简教育后，39位新干部在政治部下发的调查志愿表中，有35位填“到连队去”。而他们过去曾有许多人认为基层部队“小池养不起大鱼”，要求到上级机关去。精简教育后，“向下看”成为该旅新老干部的一致呼声。某同志原为相当于营级的股长，他在志愿表里填写到：“我想到连队去任副指导员，因为我虽说参加部队工作5年，但一向是呆在机关里，不了解部队。”另一同志说：“我感到自己还不够，工作作风不

踏实，我愿意到连队去！”

二是通过完善制度进一步规范。在精兵简政初期，出现了许多问题，有些就是因为制度不完善，上级没有具体细致的政策指示，下级没有清晰明确的参考标准。但随着精兵简政的推进，各级组织也在适时调整计划，完善精简制度。比如，针对一些部门不配合干部调剂配置，只顾自己不顾全局的本位主义，北岳区四地委发出《关于掌握干部调动补充等的补充指示》，明确要求在上级统一部署调剂干部时，涉及到的部门要积极配合。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43年6月29日同一天中连续发出《关于编余人员送分区安置处理原则的规定的训令》和《关于执行“编余人员送分区安置处理训令”之补充办法》两份指示文件，从制度层面严格规定了具体的方式方法。

三是通过媒体舆论扭转观念。《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等媒体利用自身覆盖面广、信息传达及时、受众范围广等优势，积极配合中央及各级政府的精兵简政。1942年上半年，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兼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的陶铸两次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谈精兵简政，解决了很多人的心里疑惑，可以说是两次书面动员。再比如，精兵简政的安置环节，很多人挑肥拣瘦，轻视劳动，看不起生产经营工作，《解放日报》有针对性地刊发了一篇题为《转入生产中去》的社论，扭转了编余人员的错误观念。新华社也发出很多电讯，报道各地的精兵简政进程和优秀做法，给予其他地方很好的启示。类似的社论、简讯还有很多，都在助推着精兵简政的执行。



随着漫天飞舞的大雪，到达贵州瓮安猴场。这座繁荣的商镇到处洋溢着欢乐气氛。时任红三军团四师三营营长张震回忆，大家的情绪都很热烈，每个单位都举行会餐，还实行了团体拜年，杀了两头大猪，加上羊肉、鸡肉，吃了六大盆菜。不难看出，绝大多数基层官兵都沉浸在新年的喜悦之中。但对于中共中央高层领导毛泽东、周恩来、李德、博古、王稼祥、张闻天等人来说，他们并未有任何放松与欢喜。因为红军走向哪里才能突破国民党重兵包围的问题，一直萦绕在他们心头。

为确保黎平会议制定的军事路线能正确实施，纠正博古、李德错误影响，1934年12月31日下午至次日凌晨，在贵州瓮安猴场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李富春、李德、博古和伍修权（翻译）等人参加，博古在会议一开始，就提出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建议，毛泽东则坚持中央红军必须放弃这一念头，并做了详细说明，此时再回兵湘西已无可能，前面有乌江天险，后面有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左侧有跟贵阳交界的清水江，实际上彼时的红军已经处于一个危险的三角形地带。

会议通过深入讨论，发展和完善了创立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新根据地、转兵贵州、进军黔北的战略方针，做出了北渡乌江向遵义方向前进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为遵义会议确定毛泽东的主要领导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

周恩来后来曾说，猴场会议是遵义会议伟大转折的前夜。在长征途中，军事路线不仅关系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生死存亡，还关系中国革命的前途与未来，制定正确的战略作战方针是中共领导层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从通道会议，到黎平会议，再到猴场会议，均紧紧围绕这个重要问题进行讨论，在思想上、军事上和政治上做出的各项行动与决策，都为即将召开的遵义会议做了准备。这三次衔接转折的重要会议，共同构成了那场伟大转折——遵义会议的前奏。

□ 钟宪章

实现“转兵”的通道会议

1934年10月，中央机关与中央红军主力从中央革命根据地撤离，计划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湘西，然后再创建新的根据地。在此战略转移过程中，由于党的主要负责人博古及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等人不懂军事，错误指挥，致使红军遭受了巨大损失，在连续突破国民党军四道封锁线并渡过湘江后，红军人数从最初撤离时的8.6万减少到3万余人。但危机并未解除，红军仍然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蒋介石调集了10倍于红军的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在这样的局势下，需要中央领导层作出究竟向何方转移的重要决策。

12月12日，红军到达湖南通道后，中央军委决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战略转移的前进方向问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和李德等人参加会议。失去红军实际领导权的毛泽东，受周恩来邀请，也列席了这次会议。大家意见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博古、李德仍坚持原来计划，应该“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萧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二是列席会议的毛泽东根据当时困境作出的调整计划，建议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并力求说服博古等领导人。毛泽东的见解卓越非凡，他在中国革命的内外交困之际，再次展现出力挽狂澜于既倒的能力。他的转兵主张更是得到了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大多数人人赞同与支持，但李德、博古等人仍坚持原定计划与二、六军团会合。

由于中央领导层意见不统一，通道会议虽然通过了毛泽东的建议，但未能对战略转移大方向作出决定。会议结束后的当日19时半，中革军委发出“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的部署”，命令部队攻占黎平，打开入黔通道，实现了从北上到西进的“转兵”。

在战略转移的大方向问题上，通

遵义会议的前奏

核心阅读

1934年12月至1935年初，党中央领导层围绕中国革命军事路线、战略方针转变先后召开了通道、猴场、黎平三次会议，确定了正确的战略转移方向和作战方针，纠正了党的“左”倾错误，改组了党的领导成员，逐步确立了毛泽东对党和军队的领导权，保证了中央正确军事路线的执行，为即将召开的遵义会议做了准备。

道会议虽然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但为随后黎平会议决策红军战略计划转变作了必要准备，促进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会议果断地决定中央红军进入敌军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从而避开强敌，既避免了红军遭到进一步的损失和消耗，又为红军赢得了相对喘息的时间，更为改变红军进军战略方向迈开了正确的第一步，是红军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起点。

转变战略的黎平会议

1934年12月15日，中央红军占领黎平，按照之前的军事计划，部队还是要向湘西转移。通道会议虽然在行军路线上作了一些调整，决定进军贵州，但未从军事战略、组织领导和政治策略上作根本性转变，黎平会议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而召开。这也是中央长征以来召开的首次政治局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李德因病未参加会议。与会者激烈争论了红军进军路线问题，首先发言的是博古，他始终认为共产国际同意的决定，不能打丝毫折扣，所以一定要进湘西同二、六军团会合。毛泽东力主红军应改向黔北进军，在黔边地区创建以遵义为中心的新的根据地，从而彻底放弃原来的行军方向计划。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和周恩来等人尖锐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非常赞同并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议通过了《中

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彻底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

会议之后，李德看到周恩来送去的黎平会议决定译文，非常生气，与周恩来发生了激烈争吵，两人针锋相对，周恩来更是拍案而起，把搁在桌上的马灯都震起来熄灭了，工作人员赶紧再次点灯。

在转变战略决策上，黎平会议起了关键性作用。毛泽东的正确军事路线被采纳和执行。博古、李德等人顽固坚持的错误军事路线被否定和停止。黎平会议之后，关于中央政治局的新决定，中革军委立即转发并要求各军团首长将其传达到师及梯队首长，同时立即对部队进行整编。12月19日，中革军委做出《关于执行中央政治局十二月十八日决定的决定》，将分为左、右两个纵队向黔北地区中心遵义方向前进。

黎平会议作为长征以来首次党内最高级别会议，诚如胡锦涛所言：“黎平会议在党和军队的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更为重要的是，黎平会议以中央政治局名义真正结束了自1931年赣南会议以来毛泽东在中央领导层严重受排挤和被边缘的状况，一个中央绝大多数领导人支持、拥护毛泽东正确主张的崭新领导局面开始形成。

奠定基础的猴场会议

1934年的最后一天，中央红军伴

核心阅读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是不断巩固党的执政根基的现实需要，是答好新时代考卷的必然要求。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贯穿党的革命、建设、改革全过程，是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向着美好未来和最高理想前进的永恒主题和力量源泉，要时刻坚守共产党人的这一精神家园。

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中国共产党从建党第一天起，就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义无反顾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把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并坚定笃行，展现出中国共产党非凡的责任担当和改写历史的非凡气魄。

从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红船精神到艰苦奋斗、星火燎原的井冈山精神；从坚持真理、勇于修正错误的古田精神到艰苦卓绝、一往无前的长征精神，从艰苦奋斗、理论联系实际延安精神到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西柏坡精神，这些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红色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战争年代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生动诠释。历史表明：初心和使命是中国共产党人身上与生俱来的优秀“基因”，成为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胜利的成功密码。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份初心与使命，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共产党人接续践行、从未改变。从艰苦创业、为国争光的大庆精神到团结协作、战天斗地的红旗渠精神，从无私奉献、乐于助人的雷锋精神到亲民爱民、知民为民的焦裕禄精神，从铁胆忠魂、忘我拼搏的航母精神到自主创新、精益求精的蛟龙精神，从守望相助、同频共振的扶贫精神到刀刀向内、抓铁有痕的改革精神，这些在新中国建设发展改革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时代精神，不仅将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挠、开拓创新的“精气神”写入史册，也将这份初心与使命融入中国共产党的血脉，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力量。

历史和现实充分表明：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带着初心和使命写成的，初心和使命是我们党全部理论和实践的逻辑起点。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不竭力量源泉。

不断巩固党的执政根基的现实需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任何一项伟大事业要成功，都必须从人民中找到根基，从人民中积聚力量，由人民共同来完成。违背人民意愿，脱离人民支持，任何事业都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是不能成功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民群众是党的根基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他在2012年《求是》杂志撰文指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201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强调：“党的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人民拥护和支持是党执政的最牢固根基。”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他再次重申“坚信党的根基在人民”。这些论断绝不是空洞的政治口号，是决定党的生死存亡的科学真理。

政党的生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支持者、支持率、支持度，正所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淮海战役期间，543万翻身农民组成支前民工，88万辆小推车如排成两行，可以从南京一直排到北京，这就是人民的力量。正所谓“人民齐心，其利断

坚守共产党人精神家园的永恒主题

□ 时绍祥 王素娟

金”。初心不改，使命在肩，永远保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赤子之心，时刻牢记共产党是人民群众的政党，人民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根基，离开了这个根基，党就成为无根无基的党，或者就不再是人民群众的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筑牢根基，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

答好新时代考卷的必然要求。深谙历史兴衰之道、政权更迭之律的毛泽东，曾经在60多年前极具前瞻性、极具战略性地提出了“赶考”课题。毫无疑问，掌握执政权力、支配执政资源，一方面我们党拥有了为民谋利、为民造福的有利条件，但同时也带来了以权谋私、背离民意的各种可能。赶赴执政之大考，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就是党能否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西柏坡参观，他感慨万千地说：“当年党中央离开西柏坡时，毛泽东同志说是‘进京赶考’。60多年过去了，我们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但我们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依然严峻复杂，应该说，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60多年的实践证明，我们党在这场历史性考试中取得了优异成绩。同时，这场考试还没有结束，还在继续。”习近平总书记等多个场合反复强调的赶考精神，实际上就是反复警醒全党要始终做一个清醒的“赶考”者，补足精神之钙、筑牢理想之魂，用坚定不移的初心情怀，时不我待的使命担当，答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考卷。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我们党之所以能实现从小到大、由弱变强，跨出一道又一道沟坎，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取得一场又一场胜利，赢得一次又一次辉煌，就是因为从举旗的那一刻开始，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所指出，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